

# 第一编

开天辟地：

亲历者谈「一大」



“一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读者将要看到的，是9名亲历者回忆或述评这件大事的11篇文章。亲历者的回忆，是否等于事实本身？“一大”当事人之一董必武说得好：“回忆因为各人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距直接获得印象的时间又有相当间隔，所以把几个人各自回忆参照着看，就有同有异。”董老还说：“回忆那时的事，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如果加上现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你们想想，两个人回忆同一件事，如果事先不商量，回忆的结果就不可能一样。”可见，对待亲历者的回忆，也有个求实、求是的问题。当然，专门的研究是专家的事，但对一般读者来讲，阅读、品评历史亲历者之说，比较浮光掠影于第二手、第三手之类的“纪实”，会另有一番意味——这恐怕也是不待赘言的。

【编者】



# 毛泽东回忆党的“一大”前后的思想和活动

## 革命的序曲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学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直到一九二七年，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

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最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了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的一位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都城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在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一九一九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天津后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文了，而且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点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更糟糕的是我仅有—双鞋又给贼偷去了。噫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双鞋，还足够买—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路盯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发现已经有人募集—大笔钱，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提供—笔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启程回长沙了。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中还有过这些游历：

我在湖南曾沿着洞庭湖作了徒步环行。到保定时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在渤海湾的冰上散步。《三国》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和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泰山绝顶 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 我在当时看来 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比美的成就。

我回到长沙以后 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五四运动以后，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编，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协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组织。这个书社 和新民学会——特别是新民学会——都强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坏蛋。我们领导了一次反对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要求撤换他，并且派代表团到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鼓动——当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以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们的反对。

在这以后我又代表新民学会前往北京，并在那里组织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反对军阀的宣传运动。为了推动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推翻，在长沙成立了一个新政权。大致就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两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坚持谋求实行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纲领。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当时还见过胡适 我去拜访他 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我在上海 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的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 所谓独

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励同北京分离。

谭延闿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鼓吹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掌权，就立即大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且一般地赞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纲。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次斗争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胡说八道的和吹牛的对联、匾额都扯了下来。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认为是湖南的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但是赵恒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我还记得一九二〇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试图在会场上升起红旗，但是遭到警察的禁止。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听，并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依靠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我的行动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

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 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 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 国民革命时期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 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起过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 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 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 除了我以外 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当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书记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 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一九二九年被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同时也是创始人中唯一的妇女。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发起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则做得非常少。湖南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斗争极其频繁。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工人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翼工人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工人运动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而且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支持了他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也很很有势力，这些工会当时已经组织成为湖南省总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了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阻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我回到湖南后，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 董必武 关于“一大”的回忆

## 给何叔衡的信

叔衡同志：

二十六日的信，今日午后接到一张欠资的通知后，才往邮局去取来，照你所约‘五日’之期已赶不及了。幸而有张同志之便，免得又经邮局周转，耽搁时日，不过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出来，供你们的参考。

1. 大会在一九二二年一七月(?)在上海开会。

2. 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后成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达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州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一九二七脱党)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何兰人)听说也是反对派一分子)另一个的姓名忘记了。

3. 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府作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组合，有的主张产业组合。决议是产业组合(谁是怎样的主张记不清楚)。对别党的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党脱离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非得到党的许可不得兼充其他政党的党员。决议是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关于在政府作事务官的问题，有人主张绝对不允许，有主张

得党部许可，才可作事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后面两个问题大约是上海方面的代表和决议案的精神不甚一致。

4. 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密探所知 未及成会 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 我们到嘉兴东湖 应为南湖 ——编者注 船上 将会开完。

5. 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央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

以上是我所能记着的 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 请问问他 当更知道详点。此致革命的敬礼

弟 必 武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创立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〇年 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 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这个组织于一九二〇年九月组成。

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一九二〇年五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 ——周佛海 他后来叛变 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约于一九三二年在红军中工作时与瞿秋白同时被杀）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现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

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荷兰人，在中国我们都叫他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我记得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门”政策 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我们还决定党员不能加入任何别的政党，包括孙中山的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我记得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 包括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

除我以外 在创党人中 还有一些是老同盟会员 例如陈独秀、戴季陶和沈玄庐。

那时，武汉中学成为湖北共产党的中心。党支部由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组成的。不久，我的最进步的十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后来，在创建湖北党支部的五个人中，有三个人离开了党，一个成为自由职业者，一个现在南京，一个现在汉口当律师。只有陈潭秋和我坚持信仰。我不知道陈潭秋怎样了，但是我想他还活着。

不久，武汉成为一个共产党的重要基地。党原拟为一所外国语学校作为宣传中心。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叫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来到武汉任教，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所以他们又返回上海。

一九二一年夏天 陈独秀亲自到武汉 并在一所教会学校——文化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他恰巧遇到一该校有联系的工人，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这个工人加入了湖北省共产党，并通过他的棉厂的一

些工人联系。这样，党在工业部门获得了扩展。

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 热衷于搞“新农村运动”。这个团体的中心在中华大学，他们创办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他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最早最优秀的青年领导人之一。这些“新农村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 但是 不久他们就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恽代英在四川入了党，于一九三二年牺牲。

我们湖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有三十名代表出席。我们派学生到农村去建立组织和进行宣传，他们的工作对一九二三年平汉铁路大罢工有很大影响。

我的第二个工作是去四川重新做我们过去做过的争取军事力量转向革命的工作，这是老的策略。那时，四川某些军队有反军阀倾向，所以我们到那里去开展这个运动。我花了一年时间做这个工作 后来党便命我回湖北。另外 武汉中学急需经费 也要我回来为之筹款。

我回来看到学校和工厂党的工作有了如此大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那时，平汉铁路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我们有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设在长辛店。

我父亲在武昌教书 病了 我送他回老家 回去不久死了。当我回到武汉时，一九二三年平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张国焘担任大罢工的领导工作。

因为我仅仅被认为是一个有名的国民党员，并不是共产党员 所以仍然能留在武汉。直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连我家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我的妻子到武汉时才发觉了。她是一个老式的妻子，一九一〇年家里让我与她结婚。我只有一个小孩 她就死了。

## “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

“一大”问题 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威辛斯基，以后又三个人来到北京。当时陈独秀是北大文科主任 办过《新青年》影响较大，我们也受影响。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找了个会讲俄文的人，这个人就把国际代表介绍给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会讲俄文，有口才 几个月学会了中国语，这个人来是组织共产党的。后来陈独秀去广州，在广东的教育委员会当主任。

开这么大的会，应该有个筹备会，有三件大事要做；第一是纲领 第二是宣言 第三是组织机构 都要有个准备 但当时没有筹备会。

当时共产国际说：看看哪些地方有共产主义小组，就叫哪里人来参加。我们说在文化或产业的中心北京、上海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上海、北京、济南、湖北、湖南、广州有组织 要他们来人。当时到会的还有在日本的留学生周佛海，巴黎有组织没有来人。当时准备很仓促 没有准备得很好。开会时 是叫陈独秀当主席 主持会，陈独秀没有来，就委托张国焘主持会。张国焘以前在长辛店搞工人运动 搞工人俱乐部。上海的代表是李汉俊、李达，上海的党员比较多，有七、八个人至十来个人。

“一大”代表 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 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十二人 有的讲是十三人（有人问到 有人回忆在“一大”会议上 张国焘说不准知识分子入党）当时参加党的都是知识分子。说张国焘不同意知识分子入党 那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那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 毛主席、何叔

衡都是知识分子。我也是知识分子，学生，后来搞教学的。广东的陈公博也是搞教书的，而共产主义思想也不是工人运动自发地产生的。

这里有个问题请大家考虑：“一大”没有任何文件，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两个文件没有名字，没有年月日。这样的状况是什么原因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一大”时共产国际派的代表是马林（荷兰人，托派），他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中央。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关于“一大”的情况，陈潭秋写过回忆，是到延安写的。后来李达也写过回忆，两个人写的不完全一样，有时候距离很大。主席没有写过回忆，我也没有写过。回忆那时的事，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如果加上现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你们想想，两个人回忆一件事，如果事先不商量，回忆的结果就不可能一样。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列主义的东西是很少的，当时有个《共产党宣言》翻译本，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是陈望道译的，政治经济学也是陈望道翻译的，大革命时期翻译的比较多。有一本《价值利润》是李季译的，李季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书不少，但观点比较模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没有的。布哈林有一本《共产主义ABC》

“一大”是选陈独秀当总书记。有没有中央委员会记不清了。一九六一年沈德纯、田海燕问我时，我说主席“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个回忆是错误的。我当时是根据解放后苏联交来的两个文件说的，有一个文件上写毛主席是中央委员，那是不可靠的。这两个材料在档案馆，档案馆的两个材料，我说第一个材料纲领是比较可靠的，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里面提到了“反对帝国主